

被凝视的“100万华侨”

它映照的，不只是不断扩大的在日华人群体，更是一个在全球变局与少子化压力下，仍在犹豫自身方向的日本社会。

少子化加速、老龄化加深，日本社会的焦虑开始外溢。在一个对未来缺乏信心的时代，人们总想找到一个看得见、说得清的对象来理解变化。于是，“华侨”作为一个整体，被放进了聚光灯下。

不久前出版的《日本华侨进入100万人时代》，正是当下日本社会心理的产物。此外，令人值得寻味的是该书副题：“因新中国势力崛起而激变的社会”。“激变”否定渐进与调适，表示“日本社会正在被改变”。作者指出，日本社会已被“新中国势力”改变。

从上述书名设计即可读出，这是一部高度“情绪感知型”作品，表面是在书写中国人，实则是在放大并可视化日本社会自身的不安。作者指出，2018年日本内阁批准《出入境管理法修正案》，正式扩大接纳包括体力劳动在内的外国劳动者入境。这一决定标志着日本移民政策的重要转向，可被视为日本选择了“第二次开国”。尽管当下日本外国移民的现实就是日本政府决策的结果，但日本社会并未形成接受这一个现实的心理准备。

书中反复使用“日本华侨”这一概念亦非偶然。相较于“在日中国人”，“日本华侨”更凸显日本社会如此巨大群体的性质。这一称谓容易将个体的迁移经验，隐性地与国家崛起和地缘政治竞争连接起来，使原本属于社会与生活层面的议题，被推向政治想象。

该书作者是4名日本经济新闻记者。他们深知“100万华侨”所具有的心理冲击力。在



刘迪

表面是在书写中国人，实则是在放大并可视化日本社会自身的不安。

人口持续减少成为默认前提的日本社会，“他们在增加”很容易被理解为秩序正在发生变化。虽然书中并未刻意制造恐惧，却精准击中了这一敏感神经。

本书通过“教育移民”、“类中国”经济圈，以及对寺庙、酒藏乃至火葬场等领域的介入，勾勒出中国人进入日本并持续扩展生存空间的多种路径。

该书写作契机来自作者体验。在清晨通勤电车中，人们低头沉默，几乎没有交谈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作者注意到附近两组中国亲子在低声交谈，声音并不突兀，却清晰可辨为中文。根据断续谈话片段，作者判断两组亲子均定居日本。作者并未评价这种情景有何不妥，但仅是同一车厢中就同时出现两组中国亲子这一事实，便对他形成“强烈震撼”。

因此，这本书真正呈现的，并非简单的“对中国人的恐惧”，而是多重社会心理的叠加：既有对人口持续减少、社会结构难以逆转的前景焦虑，也有对国家是否仍具备管理深刻变化能力的不安，更有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背景下，对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边界的重重新确认。“日本华侨”在此被看见、被命名，并非因其自身构成问题，而是因为关于构筑怎样的未来，日本社会尚未达成共识。

这本书是一面镜子。它映照的，不只是不断扩大的在日华人群体，更是一个在全球变局与少子化压力下，仍在犹豫自身方向的日本社会。民

✉ [发自东京]